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2015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李崇光 吕新业 青 平 主编



本书主要是针对农业技术经济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经营机制创新与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经济与低碳农业发展等当前的热点问题。

 中国农业出版社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 2015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李崇光 吕新业 青平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 2015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崇光, 吕新业, 青平主编.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109-22059-1

I. ①适… II. ①李… ②吕… ③青… III. ①农业技术经济学-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F32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8059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策划编辑 夏之翠

文字编辑 蔡雪青

北京万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26.25

字数: 776 千字

定价: 9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编写委员会

主 任 刘 旭

副主任 王济民 孔祥智 王慧军 吕火明 李 容

李大胜 李崇光 李翠霞 吴敬学 辛 贤

张广胜 周应恒 黄季焜 蒋和平 曾福生

霍学喜 戴 健

主 编 李崇光 吕新业 青 平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排序)

包晓岚 孙 剑 张俊飏 张宁宁 李谷成

郑炎成 罗小锋 杨福霞 陶建平 颜廷武

前言

由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主办、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 2015 年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于 10 月 10—11 日在美丽的江城武汉召开。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会长刘旭院士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济民研究员主持会议。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本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全国各地代表的大力支持，共收到学术论文 135 篇，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 326 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以后，研讨会全天进行了大会专题报告，与会学者享受到了一场场精彩的学术盛宴。上午大会的专题报告由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青平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钟甫宁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池波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霍学喜教授分别就“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促进中国小规模农户的转型”“新形势下农业科技进步的方向选择”“现代农业支持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分别做了专题报告，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想。

下午的大会专题报告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吴敬学研究员主持，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青平教授、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温涛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丁士军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辛翔飞研究员分别围绕“农产品伤害危机背景下网络意见领袖动员方式对网络集群行为的影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新形势与新思考”“农村贫困瞄准问题”“规模化养殖与中国肉鸡生产的技术效率”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个大会会场秩序井然，提问有序，回答深刻，全面反映了农业技术经济学人的优秀治学精神。

大会专题报告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探讨和交流。大会分“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经营机制创新与现代农业发展”“资源环境经济与低碳农业发展”4 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分别由张利国教授、曾福生教授、蒋和平研究员和王雅鹏教授主持，由周应恒教授、蒋远胜研究员、王济民研究员和吴敬学研究员进行分会场评议，来自全国各地的 26 位代表在分组讨论会上做了交流。参会代表踊跃发言，讨论热烈，百家争鸣，学术氛围浓厚。现将各分组讨论的主要交流成果综述如下：

一、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此问题，本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探讨。李燕琼分析了土地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对土地规模经营与农业效率的影响，认为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农业效率三者之间存在紧密相关性，由土地流转所形成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能够带来农业效率的提高，但这种效率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曾华盛通过对广东省土地流转模式的考察与比较，分析了

不同模式的利弊以及农民的满意度,指出需要采取政策措施来进一步完善各种土地流转模式。黄惠英在对蛛网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基于 Nerlove 供给反应模型对我国蔬菜的供给反应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蔬菜价格指数波动对蔬菜供给在短期和长期都有着显著影响。曾玉荣和康海琪分别对福建和内蒙古的家庭农(牧)场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土地规模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他们还总结了家庭(农)牧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陈玉珠考察了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禀赋对农户玉米种植选择的影响,认为一般文献提出的收入替代效应并不足以完全补偿劳动力的损失,必须高度重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玉米生产的影响。另一方面,农业要实现规模化经营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支持,常伟基于大规模农地流转的田野调研资料,发现强关系、准强关系、准弱关系和弱关系等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地流转租金有着不同的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政策工具。

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能够有效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周晓时通过考察农业技术效率的异质性及稳定性,发现农村电力、公路和灌溉设施等能够有效提高农业技术效率,但却又增加了农业技术效率的波动性。吴清华在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框架下,基于要素投入和成本函数的视角,详细讨论了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农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蔡起华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资本对提高农户参与意愿具有很强的作用,收入差距则不利于这种参与意愿的提高。李琪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考察了南方 11 个主产省份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指出提高技术效率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周振等基于全国县级层面的数据,证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能够有效提高试点县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粮食单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最终显著促进粮食生产。王国刚基于经济地理学,探讨了我国草食家畜的变化态势,指出草食家畜符合我国草原多、耕地面积少的现实,并分析了资源禀赋、人均粮食产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政府政策等因素对这种变化趋势的影响。

三、经营机制创新与现代农业发展

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是建设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需要。例如,提高农户家庭经营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针对如何创新经营机制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等问题,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杨东群针对发改委设定的 7 个粮食主销区,将粮食分为口粮和间接粮食消费两种,进行粮食供需平衡缺口测算,认为 7 个主销区粮食都存在一定缺口,应该建立起严格的粮食安全考核责任制。何坪华对耳标溯源系统的采用意愿、执行努力的激励因素等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激励相容的可追溯系统采用机制来促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陈富桥通过统计城市茶叶消费者的购买渠道,以网络购买渠道为参照,采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估计了年龄、文化程度等对茶叶购买渠道选择的影响,他认为相关政策的调整优化对现代农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石敏利用二元 Probit、多分类 Probit 模型和微观调研数据,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下的股份分红福利对农民劳动供给存在负面影响,并且随着农民年龄的增大,这种负面影响和替代作用随之增大,这一实证结果迫切呼唤着相关制度创新。当前,对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已刻不容缓,刘慧运用 Johansen 检验和 Granger 因果检验分析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国内外棉花市场现货价格传导机制

的影响,认为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有利于增强国内外棉花市场现货价格的协同性,该政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王丽佳以陕西 27 个合作社 393 个农户为例,通过建立合作社成员满意理论模型,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身形象、社员感知价值对社员的满意度有着非常强的影响,要提高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就必须加强合作社的经营机制创新。徐辉基于中国家庭动态最终调查(CFPS) 2012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家庭农林产品总值、农资费用总值、家庭金融总资产和家庭总土地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影响最大,这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政策引导。

四、资源环境经济与低碳农业发展

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严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现代农业发展必须要兼顾环境保护和资源承载能力。颜廷武等利用福利经济学分析方法,以农户对农业废弃物排放的响应为切入点,将该福利响应分解为经济福利响应、生态福利响应和健康福利响应,发现农民对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福利响应程度并不高,这迫切需要相关激励机制的创新。姚升在区分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基础上,采用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考察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发现正规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正规金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大正规金融供给,引导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过渡。夏庆利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和可持续的城镇化,任何城镇化都面临土地承载率和资本约束等问题,他基于土地金融创新提出了一种新的城镇化战略,包括把建设用地权收归国家,由中央银行发行建设用地权证,允许土地市场交易等。尹朝静利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面 FGLS 估计方法估计出年降水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探讨了气候变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大力发展低碳农业是缓解农业资源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具体包括构建持续稳定的农业科研投入机制、加强气象监测和农业节能减排等。蒋艳芝利用江苏泰州水稻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就测土配方技术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和施肥效率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测土配方技术对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和施肥效率具有显著效果。刘小春等利用江西省鄱阳湖区的分县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多元 Logistic 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的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发现这种优先序依次为“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三种,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在学术研讨会期间,主办方还组织专场就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与会专家就农业技术经济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内容、慕课等线上课程建设、案例库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尤其是就课程建设的原理、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各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识,期待各位同仁能够一起共同去落实,积极投身到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中去,为更好地促进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本次研讨会投稿论文涉及面很广,在论文集的编辑过程中按四个部分归类,有些归类可能不是十分妥当,敬请作者和读者给予谅解。

编者

2016 年 7 月

目 录

前言

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代际差异视角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基于辽宁省的调查 陈素琼等 (3)

规模化经营中土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北省 718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研 吴学兵等 (12)

经济利益、质量控制与农民合作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农资统购为何如此难 朱哲毅等 (21)

土地经营规模、劳动力努力程度和农业长期增长 王 景等 (33)

利率市场化、信贷配给与农民资金合作社的风险控制

——现象描述、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赵锦春等 (47)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风险控制效果 Logistic-DEA 有序两步评估 占治民等 (61)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与中国粮食产出

——基于全国县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周 振等 (71)

社会资本的农地流转载金效应 常 伟 (93)

失地农户收入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九江和襄阳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 丁士军等 (104)

收入效应与利益分配：农民合作效果研究

——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角色农户受益机制的实证研究 廖小静等 (117)

小规模养殖户退出奶业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呼和浩特周边地区为例 乌云花等 (13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青年农民精英的作用

——以河南省为例 孔祥智等 (140)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单产不确定性对我国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影响的研究 刘志雄 (149)

地方财政分权、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 邓蒙芝 (158)

规模化养殖与中国肉鸡生产技术效率

——基于随机共同前沿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 辛翔飞等 (166)

劳动力流动、社区资源与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 乔 辉等 (181)

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要素投入的视角 吴清华等 (190)

人力资源能力对农村外出就业女性职业流动的影响

——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李 旻 (198)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绩效评价	
——基于黑龙江省 44 家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调研	关立珊 (210)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以水稻生产为例	孙顶强等 (219)
我国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11 省 761 户调查数据	杨万江等 (230)
我国粮食储备管理现状和政策建议	蒋和平等 (243)

经营机制创新与现代农业发展

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禀赋对农户玉米种植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华中和东北两地区 6 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陈玉珠等 (251)
基于阈值协整的猪肉价格与 CPI 关系研究	于爱芝 (258)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林业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分析	
——以南方集体林区为例	罗小锋等 (265)
农户与经销商合作稳定性研究：市场风险分担视角	章德宾等 (271)
农业综合开发、农技推广培训与农机购置补贴效率	胡凌啸等 (281)
气候变化和适应性对我国中东部五省灌溉井供水可靠性影响	
——基于村级调查	刘瑞峰等 (292)
群体特征、边缘化与农民工市民化路径	
——基于 TT&DTHM 模型的分析	鲁 强 (306)
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对猪肉价格传导的非对称性影响机理及实证	苗珊珊等 (320)
水稻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成本效率的影响分析	杨万江等 (330)
土地股份合作制背景下福利对农民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广东南海的实证研究	石 敏等 (339)

资源环境经济与低碳农业发展

传统文化、个体态度、参照群体对农村居民生态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汪兴东等 (351)
基于替代渗透力视角的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研究	向国成等 (361)
农户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鄱阳湖区 1 009 户样本的调查	刘小春等 (373)
生物农药如何推广更有效？	
——基于调节聚焦理论的视角	郭利京等 (382)
不同经营规模下稻农生产技术效率分析	
——以江汉平原为例	刘 颖等 (392)
收支余额变动与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跨区域回流趋势	周传豹等 (400)

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代际差异视角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①

——基于辽宁省的调查

陈素琼 张广胜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沈阳, 110866)

摘要: 本文将农户分为 4 种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 通过对辽宁省 501 户农户的调研数据, 研究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 无劳动力转移的农户更倾向于土地转入, 土地转出农户中所占比重更大的是有老一代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进一步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发现: 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村到镇上的距离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产生负向影响, 而人均耕地面积则有利于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发生; 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年人均收入水平、村到镇上的距离均与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成显著正向关系, 而务农劳动力总量对土地转出行为产生负向影响。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 代际差异 土地流转 农户

一、引言

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 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 至今已有 30 年的历史。据统计, 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 2012 年, 全国农民工总量是 26 261 万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是 16 336 万人。伴随着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大幅增长, 其内部结构也已经产生了分化和变化, 其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据 2012 年全国农民工年龄结构调查显示, 16~20 岁的占 4.9%, 21~30 岁的占 31.9%, 31~40 岁的占 22.5%, 41~50 岁的占 25.6%, 50 岁以上的农民工占 15.1%, 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 新生代^②农民工已经成为主体。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给新形势下的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增加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村对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要求更加迫切。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村土地的流转, 一方面可以使农民获得土地流转性租金, 进一步激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另一方面有利于在提高务农收入的同时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罗必良, 2008)。随着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代际转换时期的到来, 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成为主力

^①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0315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031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1YJC630018)。

^②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 定义为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外出务工的青年农民工。

军,那么存在不同代际劳动力转移的农户其土地流转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主要有哪些,不同代际劳动力转移是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产生影响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二、文献综述

我国学术界对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将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结合起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文献并不是很丰富。林玉妹(2005)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比重与耕地流转面积比重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何强(2009)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观点。门新华和李明权(2005)的研究发现,影响农地流转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程度。张务伟等(2009)的研究认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程度与其土地处置方式的社会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游和远、吴次方(2010)认为,现阶段土地流转不直接导致劳动力转移。李明艳(2012)认为,劳动力非农转移能够促进土地流转,但不是充分条件。孙玉娜等(2012)的研究则认为劳动力流动并没有促进农户的土地流转。江淑斌和苏群(2012)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二者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不确定。孙云奋(2012)在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土地流转关系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劳动力流动与土地流转的耦合关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均具有密切关系。陈中伟和陈浩(2013)利用1986—2010年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具有不一致性。李中(2013)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状况与土地资源处置方式的社会化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综上,现有的文献对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的关系研究中没有从劳动力转移代际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则主要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将农户分为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转移农户,然后分析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在土地流转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中不同代际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界定借鉴王春光(2001)提出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和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划分标准,将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而20世纪90年代初次外出的算作新生代。本文将1980年以后出生的、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转移定义为新生代劳动力转移人口。在考虑到劳动力转移的代际差异和农户劳动力转移的现实状况两个方面,本文将农户分为无劳动力转移农户、新生代劳动力转移农户、第一代劳动力转移农户、新生代与第一代劳动力转移并存农户4类不同类型的农户,分别称为第Ⅰ类农户、第Ⅱ类农户、第Ⅲ类农户和第Ⅳ类农户。根据笔者在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比较这4种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否有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转移是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农户基本统计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两次对辽宁省农户的调研数据。第一次为2010年7月对辽宁省水稻主要产区大洼、新民、凌海三地水稻种植农户的抽样调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主要询问了受访农户及家庭成员特征、土地规模状况及农作物主要生产环节类型与费用等主要内容。最终得到问卷305份,有效问卷298份,占问卷总数的97.70%。第二次是2012年以沈阳农业大学为主的几大高校的三农协会的学员在寒假期间进行了有关非水稻种植农户在2009—2011年3年间的调查。调查问卷和2010年的调查基本类似。最终得到问卷210份,有效问卷203份,占问卷总数的96.67%。本文对这两次调查所获取共501户农户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 农户基本特征

对受访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做的统计分析见表1。从种植规模来看,种植面积为10~20亩^①的农户

①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亩≈666.67平方米。

占到样本总数的 32.14%，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 5~10 亩的种植规模，所有农户平均种植面积为 17.74 亩/户；从家庭外出务工（3 个月以上）人数分布来看，无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户为 294 户，占 58.68%，外出务工人数为 1 人的农户占 27.54%，外出务工人数为 3 人的农户仅占 1.60%；从外出务工者的年龄分布来看，小于 30 岁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最多，占到全部样本的 56.34%，50 岁以上的所占比例很小；从转移劳动力的不同代际分布来看，第Ⅰ类农户最多，占 58.68%，其次是第Ⅱ类农户占 20.36%，第Ⅳ类农户仅有 24 户，仅占 4.79%。

表 1 受访的农户的家庭的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	户数（户）	占比（%）	基本特征	户数（户）	占比（%）
种植数量			外出务工者的年龄		
5 亩以下	89	17.76	小于 30 岁	160	56.34
5~10 亩	149	29.74	30~40 岁	49	17.25
10~20 亩	161	32.14	40~50 岁	50	17.61
20~30 亩	48	9.58	50~60 岁	23	8.10
30 亩以上	54	10.78	60 岁以上	2	0.70
外出务工人数			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的农户		
0	294	58.68	第Ⅰ类农户	294	58.68
1 人	138	27.54	第Ⅱ类农户	102	20.36
2 人	61	12.18	第Ⅲ类农户	81	16.17
3 人	8	1.60	第Ⅳ类农户	24	4.79

注：种植面积为 5 亩以下的农户中，土地全部流转使得种植面积为 0 的农户有 17 户。

四、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分析

（一）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状况

从土地流转农户的数量看，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数量为 123 户，占全部样本农户的 24.55%，其中 97 户为土地流入户，27 户为土地转出户。第Ⅰ类农户中，土地转入户为 65 户，占全部土地流入户的 67.01%，土地转出户 17 户，占全部土地转出户的 62.96%。劳动力转移农户中，第Ⅱ类农户中参与土地转入的农户占全部土地转入户的 19.59%，而参与土地转出的农户数量仅 1 户，比例最少仅占 3.70%；第Ⅲ类农户中参与土地转出的农户占全部土地转出农户的 22.22%；第Ⅳ类农户中参与土地流入的农户数 2 户，仅占全部土地转入农户的 2.06%。可见，无劳动力转移的第Ⅰ类农户更倾向土地转入行为，相比于新生代劳动力转移的第Ⅱ类农户，存在第一代劳动力转移的第Ⅲ类农户更倾向于土地转出行为，这与我国农业劳动力主力军为 40~60 岁这个年龄段的务农劳动力密切相关（表 2）。

表 2 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土地流转参与程度

	无土地流转户		土地转入户		土地转出户	
	户数（户）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第Ⅰ类农户	213	56.35	65	67.01	17	62.96
劳动力转移农户	165	43.65	32	32.99	10	37.04
第Ⅱ类农户	82	21.69	19	19.59	1	3.70
第Ⅲ类农户	64	16.93	11	11.34	6	22.22
第Ⅳ类农户	19	5.03	2	2.06	3	11.11
合计	378	100.00	97	100.00	27	100.00

注：第Ⅰ类农户中 1 户农户既存在土地转入又存在土地转出的情况。

在对农户进行抽样调查中发现，农户转入土地的来源 80%以上均来自于农户，转出土地 100%均是转让给农户。流转土地的用途绝大部分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用于种植其他作物的比例很小，用于畜牧养殖和非农用途的没有。土地流转的类型中，全年流转的占 90%以上，季节性流转的情况很少。

（二）土地流转户的流转面积和流转规模分析

农户土地流转的面积共 1 932.5 亩，占全部种植面积的 21.74%，其中土地转入面积为 1 660 亩，占 85.90%，土地转出面积为 272.5 亩，占 14.10%。第Ⅰ类农户中，土地转入面积为 1 075.8 亩，占全部土地流入面积的 64.81%，土地转出面积 197 户，占全部土地转出面积的 72.29%。劳动力转移农户中，第Ⅱ类农户中土地转入的面积占全部土地转入面积的 26.23%，而土地转出面积在全部土地转出面积的 1.10%，占比最少；第Ⅲ类农户是劳动力转移农户土地转出的面积比重最大农户类型，占全部土地转出面积的 16.70%；第Ⅳ类农户中土地流入的面积仅占全部土地转入面积的 1.81%（表 3）。与王甲午（2011）的研究得到的截至 2010 年年末，辽宁省土地流转面积为 300.28 万亩，占总面积的 6%的结论相比，本次对辽宁省农户抽样调查的土地流转率更高。

表 3 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的土地流转流转面积

	无土地流转户		土地转入户		土地转出户	
	面积（亩）	占比（%）	面积（亩）	占比（%）	面积（亩）	占比（%）
第Ⅰ类农户	4 666	67.06	1 075.8	64.81	197	72.29
劳动力转移农户	2 291.48	32.94	584.2	35.19	75.5	27.71
第Ⅱ类农户	1 393.7	20.03	435.5	26.23	3	1.10
第Ⅲ类农户	694.93	9.99	118.7	7.15	45.5	16.70
第Ⅳ类农户	202.85	2.92	30	1.81	27	9.91
合计	6 957.48	100.00	1 660	100.00	272.5	100.00

由此可见，土地转入行为的农户更多的是无劳动力转移的第Ⅰ类农户，劳动力转移农户中第Ⅱ类农户更倾向于土地转入，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中所占比重更大的是存在老一代劳动力转移的第Ⅲ类农户和第Ⅳ类农户，家庭成员中仅有新生代劳动力转移的农户其土地转出的行为并不多见。

从土地流转户的土地流转规模来看，第Ⅰ类农户、第Ⅱ类农户、第Ⅲ类农户和第Ⅳ类农户中土地流转的规模分别为 16.40 亩/户，18.43 亩/户、8.91 亩/户、11.40 亩/户。第Ⅰ类农户、第Ⅱ类农户和第Ⅲ类农户中均是土地流转面积在 10~20 亩规模水平的比例最高（表 4）。由此可见，农户的土地流转规模并不是很大。

表 4 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的土地流转规模

		5 亩以下	5~10 亩	10~20 亩	20~30 亩	30 亩以上	合计
第Ⅰ类农户	户数（户）	13	14	33	10	12	81
	占比（%）	16.05	17.28	40.74	12.35	14.81	100.00
第Ⅱ类农户	户数（户）	3	3	7	3	4	20
	占比（%）	15.00	15.00	35.00	15.00	20.00	100.00
第Ⅲ类农户	户数（户）	4	6	8	0	0	17
	占比（%）	23.53	35.29	47.06	0	0	100.00
第Ⅳ类农户	户数（户）	2	1	1	1	0	5
	占比（%）	40.00	20.00	20.00	20.00	0	100.00

（三）流转的期限和流转租金

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时，有必要对土地流转期限进行约定。在调查中发现，并非所有农户土地流转

都对流转期限进行了约定,只有 62.60%的农户在土地流转时约定了流转期限。在约定流转期限的农户中,第Ⅱ类农户的比例最高,第Ⅲ类农户的比例最低。约定的期限在 1 年和 2~5 年这两情况最多,约各占 1/3,从而农户在土地流转时其约定的流转期限基本集中在 5 年及以下(表 5)。这比较符合对流转后用于普通农作物种植等投入较小的土地,流转期限不宜过长的原则,流转期限超过 5 年的,应建价格调整机制,明确约定调整时限和幅度,分时段确定流转价格。土地流转双方应根据土地质量、产出水平和物价变动等因素,合理确定流转价格。

表 5 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的土地流转期限

		流转土地时有无约定流转期限			土地流转的期限		
		有	无	1 年	2~5 年	6~10 年	10 年以上
第Ⅰ类农户	户数(户)	51	30	19	15	8	9
	占比(%)	62.96	37.04	37.25	29.41	15.69	17.65
第Ⅱ类农户	户数(户)	14	6	3	5	4	2
	占比(%)	70.00	30.00	21.43	35.71	28.57	14.29
第Ⅲ类农户	户数(户)	9	8	5	3	1	0
	占比(%)	52.94	47.06	55.56	33.33	11.11	0.00
第Ⅳ类农户	户数(户)	3	2	0	2	1	0
	占比(%)	60.00	40.00	0.00	66.67	33.33	0.00
合计	户数(户)	77	46	27	25	14	11
	占比(%)	62.60	37.40	35.06	32.47	18.18	14.29

在调查中发现 91%有土地流转的农户是通过租赁出租的方式来实现土地的流转,其他主要是亲属或亲戚之间免费耕种仅占 9%。从流转土地的租金看,不管哪一类型的农户,其土地流转的租金大部分集中在 101~200 元和 201~300 元这两个区间内。第Ⅰ类农户、第Ⅱ类农户、第Ⅲ类农户和第Ⅳ类农户的平均租金分别为 249.53 元/亩、246.82 元/亩、253.33 元/亩和 182.50 元/亩(表 6)。

表 6 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的流转租金水平

		100 元/亩及以下	101~200 元/亩	201~300 元/亩	301~400 元/亩	401 元/亩及以上
第Ⅰ类农户	户数(户)	12	27	26	10	5
	占比(%)	15.00	33.75	32.50	12.50	6.25
第Ⅱ类农户	户数(户)	4	3	5	2	4
	占比(%)	22.22	16.67	27.78	11.11	22.22
第Ⅲ类农户	户数(户)	2	8	5	2	1
	占比(%)	11.11	44.44	27.78	11.11	5.56
第Ⅳ类农户	户数(户)	0	1	1	1	0
	占比(%)	0	33.33	33.33	33.33	0
合计	户数(户)	18	39	37	15	10
	占比(%)	15.13	32.77	31.09	12.61	8.40

注:土地流转方式为租赁出租存在租金的农户中有 3 户的土地租金分别是 150 千克稻谷/亩、50 千克稻谷/亩和 75 千克稻谷/亩。

(四) 流转土地过程中,中介机构的介入程度

在农户土地流转过程中,由 90%以上的农户没有村集体中介或者土地流转机构来帮助其进行土地的流转行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流转双方签订书面协议的比例也不算很高,只有 44.72%的农户在土地流转时签订了书面协议,而第Ⅲ类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仅仅只达成了口头协议的比例高

达 94.12%。土地流转后农户通知村组或到有关部门登记的比例也不高,第Ⅰ类农户和第Ⅱ类农户的比例分别为 25.93%和 35%,第Ⅲ类农户和第Ⅳ类农户则为 0。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双方产生矛盾的情况也很少,其比例不足 5%,一旦遇到矛盾纠纷基本上都是自行协商解决,找村委会协调或者采用法律途径解决的很少。从表 7 可见,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劳动力转移农户,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村集体中介或者土地流转机构的介入程度较低,并没有发挥到其相应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本次调查中农户的土地大规模流转的情况并不多,从而中介机构的介入程度并不高。

表 7 不同类型劳动力转移农户土地流转的其他方面统计

	第Ⅰ类农户		第Ⅱ类农户		第Ⅲ类农户		第Ⅳ类农户	
	户数(户)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1) 有没有村集体中介或者土地流转机构,帮助您转入或转出土地?								
①帮助转入	8	9.88	2	10.00	0	0	0	0
②帮助转出	1	1.23	0	0	0	0	0	0
③没有	72	88.89	18	90.00	17	100.00	5	100.00
合计	81	100.00	20	100.00	17	100.00	5	100.00
(2) 转入(或转出)土地时是否有书面合同或协议?								
①有	41	50.62	11	55.00	1	5.88	2	40.00
②没有,只有口头协议	40	49.38	9	45.00	16	94.12	3	60.00
合计	81	100.00	20	100.00	17	100.00	5	100.00
(3) 转入(或转出)土地后是否通知村组或到有关部门登记?								
①是	21	25.93	7	35.00	0	0	0	0
②否	60	74.07	13	65.00	17	100.00	5	100.00
合计	81	100.00	20	100.00	17	100.00	5	100.00
(4) 在转入(或转出)土地过程中是否遇到矛盾纠纷?								
①有	1	1.23	1	5.00	0	0	0	0
②没	80	98.77	19	95.00	17	100.00	5	100.00
合计	81	100.00	20	100.00	17	100.00	5	100.00

五、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模型的选择

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是一个定性的二分变量,所以本文选用建立 Logistic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设因变量 Y 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若发生了土地流转的行为,因变量为 1;若没有发生土地流转行为,因变量为 0。农户有土地流转行为的概率为 $P(Y=1)$,则农户未发生土地流转行为的概率为 $1-P(Y=0)$ 。在 Logistic 模型回归分析时,通常要进行 P 的 Logit 变换,即 $\text{logit}P=\ln(P/1-P)$,经过 Logit 变换后, $\text{logit}P=\ln(P/1-P)=\mu+\sum_{i=1}^n b_i X_i$,这样就得到了概率的函数与自变量之间的线性表达式。

(二) 指标的选取

一般认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是家庭的基本情况,比如人口、劳动力是否转移、经济收入和拥有的耕地资源状况等。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如陈美球等(2008)、杜文星和黄贤金(2005)、钱文荣(2003)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考虑到农户劳动力转移的类型差异,选择从农户家庭特征、家庭经济因素、农户劳动力转移类型、耕地资源禀赋和所在村的地理位置五个方面选择一系列指标来探讨